

华人儿童社会化

吴燕和 主 编 薛素珍 副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华人儿童社会化

主 编 吴燕和

副主编 薛素珍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1 号

责任编辑:方 虹

封面设计:石亦义

华人儿童社会化

主 编 吴燕和

副主编 薛素珍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 字数 275,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5439-0689-9/Z·697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吴燕和(1)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中国儿童社会化主要特征	薛素珍(4)
第三章	以“理念类型”比较研究华人幼儿社会化	郭建文 张震东 高耀中(10)
第四章	上海幼儿家长对“好孩子特征”、“好家长特征”、“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看法 及其研究	姚佩宽 吴玉琦(18)
第五章	上海家长与教师对幼儿评价标准的比较	李洪曾 程华山 谢光庭(24)
第六章	上海幼儿家长教养观念的录像问卷调查	程华山 胡 育 李洪曾(31)
第七章	中国家庭教育传统与儿童社会化	吴慧珠(37)
第八章	父母对不同性别儿童的教育观之比较——上海市3~6岁幼儿家长社区调查 评述	傅宗碧(43)
第九章	母亲对子女教育方法选择之探讨	田 熊(52)
第十章	上海幼儿读物调查分析	李爱珍 孙士珍(63)
第十一章	台湾家长关心的“幼儿社会化”内容之探讨	...
	 高敬文 黄美瑛 陆锦英 罗素贞(67)	
第十二章	新加坡华人幼儿的社会化过程	高耀中 张震东 郭建文(77)
第十三章	用中国文化培育泰国华人下一代	婉维帕·布鲁拉达纳潘(92)
第十四章	夏威夷华裔家庭的儿童养育——传统与变迁	吴燕和 邝鹭莲(103)
第十五章	洛杉矶华裔美人与欧裔美人儿童养育价值观的比较	
	 司徒永振 赵瑞淑(111)	
第十六章	马来西亚儿童社会化、文化认同与族群意识	陈志明(118)
第十七章	“小皇帝”与“小皇后”——中国教师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看法	贝克维(130)
第十八章	研究方法之外“对话”与“人生真相的追求”的反省	高敬文(141)
第十九章	上海、台湾屏东地区家长教育目标与方式的比较研究	高 峰(156)
第二十章	当代中国父母对子女社会化目标的认识及其意义	刘豪兴 朱少华(163)
作者简介		(169)

第一章 导 论

吴燕和

中华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研究华人儿童社会化,以及中华文化意识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养成,是世界性的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无论在学术上、理论上、实际应用上都有其重大意义。本书是国际间合作研究这一课题的集体成果。

由于这一研究工作已历时4年,参加合作计划的队伍庞大,跨越几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多种复杂的新方法收集资料,因此在卷首应先就各方面做些简单介绍。

一、历史缘起与理论架构

“中国文化与社会化”是一项跨国、跨地区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1990年我在美国夏威夷的东西中心,开始推动这项合作研究,此计划是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主要课题之一。经过多方的联系与商讨,我们于6月24日~7月2日在檀香山的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对各地比较研究之筹备、经费来源、收集资料之方法以及计划之型式与期限等等,做了初步讨论和决议^①。当时决定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参加本研究,为期3年,从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通过对上述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异同,对华人和中国人家家庭内儿童社会化过程,进行调查研究,探讨当代海内外华人社会化的基本特征,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和文化行为之持续、发展、变迁。

当时在理论发展方面提出了若干基本问题和研究假设:

(一) 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之传承是否在儿童社会化的亲子关系上落实?现代化和西化过程是否一定会削弱家庭教育里的传统行为和观念?海外华人的家庭教育是否还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特点?

(二) 研究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可以了解中国人理想子女(什么是“好小孩”的特征)的理念型态(ideal type),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解释现代化和传统化的方向。

(三) 中国人自古重视家教之执行,是推动儒家“做人”的基本概念(key concept)。传统的孝道概念与道德培养,是否仍存在于今天的各地华人社会,其变与不变的内容,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本书各章提到的“社区问卷调查”,其中有多项题目针对这方面研究。

(四) 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不但是华裔和华侨子女的切身问题,不仅是个人感情和团体政治意识问题,更是海外华人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学术问题。社会科学家在外国,无论是心理学或教育学,都需要建立一套以华人文化行为特征为基础的测量工具,而不宜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量表去衡量华人行为。这点跟近年港、台学者推动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之讨论,亦有理论之结合。因此,本研究之目标,不仅是为了了解目前华人儿童社会化的现状及特征,还想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热门的话题参加对话,对海内外华人的现代化问题、文化认同的涵意、华人行为特征等方面,提出新材料和解释。

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以质的研究为此计划之方法重点,采用以录像分析为主的民族志

学形象记录法(visual ethnography)和民族志学的多义观察与解释(multivocal ethnography),并根据吴燕和等人发表的《中、日、美幼儿园》研究专书之方法论为蓝本(Tobin, Wu, and Davidson 1989),开始在1990年~1991年夏天之间,在各调查地点做些试调查。有的队伍是在1991年第二次会议时(6月21日~7月1日在美国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召开)才确定的^②。无论如何,我们决定在各研究地点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同样的任务,收集同样的资料,以便将来做跨地区的比较与分析。本书各篇内容,除了第七、十七、十九、二十之外,都是根据1990年与1991年的两次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研究结果。本书论文中常提到一些本计划参与者熟悉的名词,并非读者能够明白的,故在此稍作解释和说明。

二、研究方法简介

本计划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研究:

1. 个案录像调查

本研究对象一律以3~6岁的幼儿家庭为主。在上海、高雄和屏东、曼谷、新加坡、洛杉矶五地,选择几个对象家庭,记录幼儿在家庭中生活的总体情况,包括某一天室内和室外的各项活动。孩子与父母、亲友的关系、交往和活动;如起床、梳洗、玩耍、学习、进食、洗澡、睡觉,包括偶而发生的哭吵及与人打闹、父母的哄骗及训斥,记录一日生活之日常现象、情绪变化和戏剧性情节等。各地由于实际条件之许可与否,每地录制了2~6盘不等的幼儿家庭生活录像带。

第二步工作则是选出几个带子,经过剪辑浓缩至半小时以下长度(一般为20~25分钟),经过第二次工作会议的评论和解释,决定每个地方选出一个作为下一步请大量家长和幼儿教育工作者评价的个案录像主带,进行评价和录像反映问卷调查。

2. 录像问卷调查

录像观看与问卷方法的基本精神,是以代表一个地方的主带做为刺激物,放给家长或教师观看之后,反映出他们对幼儿及家长的行为和关系之评价,表现个人或社会大多数人主观赞许的社会化手段和目标。这就是本书许多章节报告的内容。为了统计分析之一致,我及东西中心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份录像问卷调查表,有中英文两种,此表在上海试调查应用之后,并经过第二次工作会议商讨,制定此调查表分为两部分的标准问卷。第一份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身份、教育程度、职业等基本概况,以及参加问卷调查者对“好家长”、“好孩子”、“家庭教育主要任务”看法的3个开放性问题。第二份问卷包括对16个问题的评价等级的选择,这些问题涉及对录像中的孩子行为、父母教育方式和亲子关系的评价。

在组织观看录像与问卷调查方面,决定各地区选择500名(3~6岁)幼儿的父母亲作为调查对象,将这500名家长分为5组,每组各观看本地主带及一个外地主带。例如上海有600名家长参加调查,观看了上海幼儿家庭和四个外地家庭的录像带,他们填写录像问卷调查的第一部份,其结果可以参看本书第四章中的报告。由于实际情况各地不同,台湾地区南部发动幼儿父母参加调查的人数远比要求的500名为多,但是在美国和新加坡则不容易找到华人家长参加,故人数距离要求甚远。

3. 社区问卷调查

对管教子女的看法,我在东西中心也设计了一套问卷,基本题目是根据中国文化教子的许多传统观念,询问家庭教育之内容,测验现代父母保持文化传统价值的多寡。这些题目,经过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补充、修改而确定44题的社区问卷,要求各地区选择数百名幼儿家

长进行调查,其结果也作为本书中多篇论文讨论的内容。

4. 儿童读物的调查

本计划的学者专家,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作会议上,也介绍了各地儿童读物的内容和出版状况,从畅销书方面去了解父母和幼儿喜爱的读物,进而分析道德教育的情况,本书只收集了上海调查的儿童教育部分,其它各地的调查尚待另文发表。

由于第三次工作会议(1992年9月在香港召开)和第四次研究发表会议(1993年8月在夏威夷召开)都邀请了本计划之外的学者专家参与或递交应用本调查资料撰写的论文,因此他们的几篇跟中国或华人有关的论文也收集在本专集里,这就是七、十七、十九、二十章以及第三章的“理念类型”探讨华人幼儿社会化的论文,关于社会化一词的定义和内涵,也在第三章加以解释了。

三、致 谢

本书的出版只代表此一国际合作研究的初步成果,今后仍待陆续出版各地研究专集和更多的比较分析之论文。我们希望本书带给家长们、教育学者和许多对中华文化关注的读者一些新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海内外各地华人的家庭教育现状,以及对中华文化传统认同的趋向。今年是本研究计划进行的最后一年,本书之出版还盼学者专家加以批评和指教,以便我们做好下一步的撰写和出版工作。

本计划由1990年开始,无论在人力、财力和脑力上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或协助,我们在此不能一一致谢,只列出部分机构和人名:

我们感谢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前主任李浩(Victor H. Li)博士对我和本计划的一贯支持;感谢各地课题组的主持人,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薛素珍教授,台湾屏东师范学院高敬文教授,曼谷法政大学婉维帕(Walwipha Burusratanaphand)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张震东教授,夏威夷大学邝(Rowena Fong)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司徒永振(Stanley Sue)教授。在经费支援和人力贡献上,我们特别感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工作部、上海市教育局、上海科学教育研究所、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屏东师院、科学委员会、曼谷法政大学泰国文化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亚裔美国人精神卫生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系)等及台北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李沛良院长。

王维兰女士自始参加本研究计划之设计与安排,协助各次会议之组织,并帮助校订书稿,我们向她致最大谢意。

注释:

①出席此筹备研讨会的学者包括来自中国上海精神卫生研究所、云南昆明师专、台湾屏东师院、台北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夏威夷大学和东西中心(East West Center)的多位学者和研究院学生等。王维兰女士参加了各种问卷的设计和试调查。

②第二次工作会议(1991年6月21日~7月1日)在檀香山东西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代表上海地区参加的有李洪曾先生和李爱珍女士,代表台湾地区参加的有高敬文、柯华藏、陈亦麟教授等,代表新加坡的有张震东和高耀中教授,洛杉矶则为司徒永振教授,曼谷为婉维帕教授,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文化研究中心参加的则有吴燕和、杜维明教授等。

参考书目

Tobin, Joseph, David Y. H. Wu, and Dana Davidson 198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Japan, China, the U. 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中国儿童 社会化主要特征

薛素珍

中华民族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除了居住在本土的华人之外,几乎世界各国都有华人的足迹。研究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化过程,提高五分之一人口的素质,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优化有重大的意义,对世界人口素质也有较大的影响。

历史长河是延续发展的,昨天联系着今天,今天联系着明天,人类社会一代又一代地绵延下去,下一代人接受上一代人积累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着社会体系,也影响着人们的个性形成。对社会来说,社会化是维持代际关系、延续文化遗产、形成社会创造力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社会化就是人从诞生开始,通过个人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学习生活技能、行为规范、吸取社会的文化,成为社会一分子的过程。

人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地域、社会制度,其社会化之目标、内容、形态、方法有较大的差异,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有所变化,本文拟从社会变迁中当代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特征作初步的探讨。

一、被调查儿童的父母及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基本状况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趋势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共识。经过十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之后,价值规律成为主导机制,这一转变促使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而变化,这不但影响当代人的社会化,也促使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社会化的思考。

1991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化”上海课题组根据吴燕和教授等设计的“上海幼儿家庭教育社区问卷”的内容对全市3至6岁的500名幼儿的父亲或母亲进行了调查。其中母亲答卷的295人,占59.00%,父亲答卷的205人,占41.00%,答卷者年龄分布:21~25岁,0.20%,26~30岁,9.20%,31~35岁,53.40%,36~40岁,33.20%,41~45岁,4.00%;文化程度:初中和初中以下24.40%,高中49.60%,大学与研究生26.00%;职业分布:工人48.60%,专业技术人员17.00%,商业服务人员11.40%,干部7.20%,职员6.80%,教师6.00%,医生1.60%,文体0.60%。其它0.80%。

从以上三项指标分析:答卷人的年龄处于中青年阶段,他们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成长,成家立业,生育子女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绝大多数达到高中文化和高中文化水平以上;职业分布面较广,工人最多,其次专业技术人员。

被调查儿童的基本情况:500个幼儿中男女孩各占50%。年龄分布在3~6岁之间,除6岁幼儿人数较少之外(1.00%),3岁、4岁、5岁的幼儿基本相仿(33.40%、33.20%、32.40%)。他们白天均在幼儿园中生活、游戏、学习,傍晚回家。

幼儿的家庭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家庭收入普遍有所提高,独生子女政策使家庭人口减少,因此一般来说,大多家庭比以往富裕,使幼儿的生活环境优化,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二、当代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特征

社会变迁使儿童成长的社会与家庭环境的变化较大,以致父母对子女培养的目标、内容、形态、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特征之一:家庭教育的主要目标与内容是以“忠”、“孝”为中心展开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承前继后的过程,传统和现代之间,现代和未来之关系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人的社会化也是这样,每一时代的社会化都与先前历史时代的社会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并以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导向。传统家庭教化是现代家庭教化的历史基点,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类的素质一代胜一代,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社会化的目标总是高于自身的。

家庭是人类社会化的摇篮,父母是子女的主要施教者,第一个老师。父母的生儿育女观念是指导子女社会化的核心。据调查,许多家庭保持传统的教育目标与内容,教育子女要忠于祖国,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是中国人,对子女进行中华民族之“根”的教育非常重视。答卷者回答“华人父母教养孩子时,都应该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华人”。这一题中持赞成态度的93.20%(38.00%的答卷者表示极赞成,55.20%的答卷者表示赞成)。在37个问题中,答卷人数比例居第五位。做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代代相传。父母教育子女对国家要忠,对长辈要孝。传统的生儿育女观念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继承家庭的事业和家产为目的。为此,要求子女敬重长辈,一言一行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这就成为父母心中的“好孩子”。在回答“应该教育孩子敬重长辈”这一题,持赞成态度的98.20%(57.20%的答卷者表示极赞成,41.00%的答卷者表示赞成),在37个问题中,答卷人数比例居第二位。

上述分析,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忠”、“孝”仍是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目标与内容。

特征之二:大多父母意识到培养子女要符合21世纪社会主人的要求。

当代儿童社会化继承传统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代特征。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社会变化过程,人们也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持续地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以适应变革中的社会。我们这一代人考虑自身的社会化,怎样适应当今社会,与时代同步前进之外,也很自然地会考虑下一代人的社会化问题。客观形势提醒我们,对下一代人的教化不是制造我们这一代人的“复制品”而是培养21世纪的新人。美国诗人福楼拜早就号召诗人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影于客观世界,不要复制现实,以便创造第二个现实——艺术。在人的社会化问题上也是这样,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化不是塑造“复制品”,而是培养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新主人。调查表明有相当数量的答卷者开始意识到既要使孩子继承传统,适应现代,更要为他们符合未来社会的要求着想,当父母的重视子女的个性发展,培养他们独立的人格。这一转变反映在父母对子女教养的形态和方法上,家长制的棍棒教育方法有所变化,注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子女,尊重子女的意见。从以下几个问题的回答中可看到较明显的转变: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持不赞成态度的83.60%(不赞成69.20%,极不赞成14.40%)。

“棒头下出孝子是有道理的”——持不赞成态度的 77.60% (不赞成 61.20%, 极不赞成 16.40%)。

“父母管教小孩,一定要小孩听从,不能回嘴”——持不赞成态度的 73.20% (不赞成 67.20%, 极不赞成的 6.00%)。

“即使跟父母的意见有出入,应该让孩子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持赞成态度的 98.00% (极赞成 36.00%, 赞成 62.00%)。在 37 个问题中答卷人数比例居第三位。

上述分析,父母为了使子女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的需求,重视子女的个性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培养等方面,在教养形态和方法上与传统家庭的家长制,棍棒教育,要子女唯命是从的情况迥然不同。

特征之三:重视知识与人才培养。

自我国提出现代化建设,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期在本世纪末达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快了步伐,促使国富民强,步入世界强国之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密切相关。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从事社会生产劳动主要依靠体力而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则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熟练技能。回顾人类历史,文艺复兴以后,中世纪随着神学禁锢的逐渐消失和各部门科学的兴起,人类凭藉知识取得了对自然的支配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飞速发展。面对这个事实,英国大哲学家弗·培根作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哲学概括。从近代社会情况分析,世界上生产发达的国家也是科学、文化领先,这些国家重视知识,器重人才。同样在我国亦然,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知识,培养人才。社会的大方向也往往是人民社会化的目标。我们这次调查中,许多答卷者在重视子女健康、道德品质培养的同时,比较突出地对子女的智力投资。96.00% (极赞成 37.60%, 赞成 58.40%) 的答卷者认为“教养孩子的一大目标是让孩子将来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在 37 个问题中答卷人数比例居第四位。在我们进行家访中,孩子的父母主动地给我们参观为发展孩子智力的书籍、录音带、乐器、画具、电子游戏机等各种学习工具与玩具。有的父母还让孩子为我们朗诵诗歌、念英文、画画、舞蹈等方式以显示孩子的才能。从录像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情景。个别家庭的父母,管得其在幼儿年龄阶段的女儿没有一点主动权和自由活动时间,甚至春节期间也不放松,勉强女儿完成父母规定的功课。去祖父母家拜年时,其父亲还要正在发烧的女儿朗诵、跳舞,以取得祖父母的欢心。父母重视子女的智力发展,自幼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教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其方式方法是值得研究的,有些方法,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影响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甚至使孩子失去童年的欢乐。

社会重视知识,器重人才是当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儿童社会化的时代特征,这已为人们所共识。许多父母通过丰富子女的科技、文艺活动与科学、文化生活,给子女传递祖国的主文化。同时,父母对子女文化程度的期望也比较高,除了极少数答卷者只要求其子女达到初中或高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大多数答卷者希望子女达到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子女文化程度高低,一般来说是相关的,答卷者本身文化程度高的对子女的文化程度期望也高,低者也低。可是,根据调查数据分析,也有一半以上的答卷者,本人文化程度中学水平而期望子女受到高等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人们愈来愈感到知识的重要性,父母对子女的智力发展十分

重视,期望他们能达到大学、研究生水平。

特征之四:对男、女孩社会化之目标比传统家庭之差距有所缩小,但仍有差异。

我国有史以来,维护父系、父居、父权家庭世系制。宗法社会规定只有男子能传宗接代,续谱世系。家族主义是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支柱。家庭有了男孩才能使家族得以延续,使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事至今日,家庭、社会、国家仍以性别分工,维持男权中心的社会,使女性处于从属男性的地位。

人的社会化也受根深蒂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传统的性别观念阻碍了男女平等的实现。虽然自有史以来,男女并肩作战,为人类同样作出了贡献,可是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地位均低于男性。几千年以来,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已内化为人们自觉指导行动的准则。

前文已提及 96.00%的答卷者认为教养孩子的一大目标是让孩子将来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对子女的文化程度期望是较高的。但对男、女孩文化程度的期望是有差异的。虽然答卷者都只有一个孩子,按理说男、女孩应一视同仁,可是根据资料分析,答卷者中期望男孩受高等教育以上的人数占总数的 86.20%,期望女孩受高等教育以上教育人数占总数的 69.20%,相差 17 个百分点。即使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答卷者,也受性别歧视的影响。他们期望男孩受高等教育以上的 91.40%,而期望女孩受高等教育以上的 80.00%,相差 11 个百分点。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期望高于女孩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父亲对女孩教育期望高于母亲对女孩的教育期望。母亲对男孩的教育期望要高于父亲对男孩的教育期望。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作一般的解释,前者可能由于独生子女的关系,家庭中没有男孩,父亲只有期望女孩受到高等教育;后者也许由于母亲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女孩的主要天地是狭小的家庭,生儿育女,教子相夫是她们的主要责任,故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就可以了,而男孩的天地是广阔的社会,参与社会竞争,需具有高等文化水平。此外,“母以子为贵”的传统思想影响。关于这一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目前,儿童社会化目标、内容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影响着女性的社会参与,也影响着女性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家庭中的地位,使女性从属于男性。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男女不平等,要改变这种局面任重而道远。

特征之五:被调查的儿童均为独生子女,与一般儿童社会化有其共性也有特殊性。

自 1979 年,我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来至今已有 14 年了。14 岁以下的儿童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这次调查的 3~6 岁的 500 个幼儿均为独生子女,其中男、女孩各占一半。

关于独生子女社会化的问题,与一般儿童社会化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独生子女的特点就在于其“独”,即他们生长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中。而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对儿童社会化有重大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交往是儿童最早的社交生活,他们之中既有手足之情亲密接触,又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是早期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来自成人世界的压力比非独生子女大。由于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全家人的期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以致使这个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受到过分宠爱,过度保护,过多照顾,过高期望,从家访中及录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目前,随着社会变迁,加速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有相当一部分父母已意识到这样的教育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发展,影响他们今后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谋生的本领,注意到幼儿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和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问卷

中所有的问题,答卷者认识程度最一致的,也是37个问题中答卷人数比例最高居首位的问题,“学龄前小孩应会自己穿衣、洗脸、刷牙”。答卷者表示极赞成的49.00%,赞成的50.00%;回答“孩子还小,不应该训练他帮做家务”,这一题不赞成的77.40%,极不赞成的14.00%;录像中也看到孩子自己穿衣,学洗手帕等镜头。

由于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生活条件比非独生子女优越,父母尽力满足子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一般来说,儿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并由于他们生活在成人包围中,儿童读物、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使他们得到的信息量多,语言能力、求知欲都较强,吸收新鲜事物也较快。另一方面,我国幼儿教育普及,幼儿基本上都进了幼儿园,我们调查的500个幼儿都进了幼儿园,按年龄分别在小、中、大班,有专业老师负责教养,自幼培养他们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智力的启迪,使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他们打下优化社会化的基础。幼儿生活在幼儿园中是愉快的,使他们特别高兴的是有同龄的孩子与他们作伴,这对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格外感到需要。虽然同伴与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不同,但同龄群之间的互动也是社交生活的重要环节,对独生子女来说,更有深刻的意义。

大多独生子女的幼儿期生活在家庭和幼儿园之间,他们在家庭中成为家庭的“中心”,处于特殊的地位,而他们在幼儿园中不可能成为“中心”,幼儿园中都是独生子女,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在集体生活中,伙伴之间是平等的,有助于幼儿的性格形成,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但是,独生子女处于家庭的特殊地位,父母教育方法不当等原因,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何根据独生子女的特点社会化,是我们面临要研究的课题。

三、讨 论

当代儿童社会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发扬与歌颂祖国文化。对下一代儿童社会化,重视“根”的教育。使儿童知道自己是华人,这是祖国强盛凝聚力的扎实基础,也是民族的光荣,使一代又一代人树立献身祖国精神的人生观。

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时代,各个阶段有其社会发展总目标。这总目标指引着人民社会化的方向。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必须适应变迁中的社会,与时代同步,自身的社会化要符合社会需求角色,个人通过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学习生存的本领,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主文化的认同和向下一代传递的能力,引导下一代在现有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新文化,使传统、现代、未来接轨,并趋向未来的儿童社会化发展是人们对社会化目标步入新的认识阶段,有利于为21世纪培养人才,以及对进一步继承、颂扬、创造祖国的新文化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人们开始认识对下一代人社会化之目标,不是塑造我们这代人的“复制品”,而是培养21世纪新主人。虽然从认识到实践有较大的距离,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往,我们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自己的意愿塑造下一代人,忽视社会变革,人的个性等客观因素。对人的评估以主观愿望为立足点,凡符合本人要求的是“好孩子”,不符合者是“坏孩子”。社会上不乏其人将“代沟”认为是问题,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沟”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包涵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看事物进步的一面。随着社会化目标的新认识,社会化的内容、形式与方法也将随之而出现新的气象。

重视知识,培养人才是当今社会与未来世界刻不容缓的社会化内容。当今科学技术革命

的浪潮席卷全世界,这不是一场纯粹科学技术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会对全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整体效应”。现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是在相互竞争中实现的,在生产竞争的后面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竞争的后面是文化教育的竞争,文化教育竞争的后面是人的智力竞争,而最终隐藏着的是人才的竞争。而今我们能重视知识,培养人才是符合客观规律,适应世界潮流的。

对男、女孩社会化总目标的差异,是影响社会上男女平等的实现,也使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不能充分地发挥她们的才能,不利于祖国建设,社会加速前进。可是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研究社会化的学者专家们对性别差异社会化与人类进步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研究的课题。

面临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国内外专家学者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弥补独生子女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地位形成的一些不良后果。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看到了社会上独生子女的普遍性,在医药、教育、科学、文化等各有关方面配合下,儿童身心发展健康,减少了顾虑与害怕的心理负担。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独生子女社会化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有其不利的一面,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只要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注意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对有利的一面加以正确的引导,独生子女同样可以茁壮成长的,国内外有些学者已作科学论断。

参 考 书 目

吴燕和(David Y. H. Wu)《家庭现代化下的中国儿童养育》 乔健等编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社会研究所 1983

吴燕和(David Y. H. Wu)《中国人口政策与独生子女的教养》 乔健等编 《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香港亚太研究所 1985

薛素珍《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与趋势》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国家教委初等教育司编 《全国家庭教育研讨会优秀论文选》 新时代出版社 1986

薛素珍、柳林《儿童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W. S. Tseng and D. Y. H. Wu “Child Training in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Bell, R. Q. 1985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effects in studies of Socializ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75:81-95

Whiting, J. W. M. et. al. 1968

“Field Guide for a Study of Social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第三章 以“理念类型”比较研究 华人幼儿社会化

郭建文 张震东 高耀中

我们如何研究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幼儿社会化的类型？特别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泰国、新加坡、美国的华人，我们又如何得出数据的比较分析呢？这份报告是个初步的尝试，企图建立一个全面性的架构，从狭隘的一面来说，它足以阐明我们的理论上的兴趣，就其广义而论又足以有系统地掌握我们正在探讨中的多方面的实际经验。

首先，让我们强调一些问题，阐明我们对华人幼儿社会化的兴趣基础。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我们关心的是“华人化”：怎样才是个华人？身为华人意味着什么？哪些是华人的价值观？华人的特征是什么？由此就带出了种族与文化认同的课题，特别在世界上有华人聚居社会的情况，是否华人的认同感在每一个华人社会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在面对其他的方面的认同时（例如国籍、宗教、阶级），种族的认同能否维持不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又为什么？

实际上，“华人化”不是属于顽石、静止或无史记载的类属；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种族认同的维持或改变的过程，没有直接的途径可以掌握我们称为“华人化”的社会现象，而无须考虑时空的因素。“身为华人”与“成为华人”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这促使我们更加关心在华人社会里幼儿社会化的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在学龄前的阶段，家庭环境与父母对抚育儿童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用一般或抽象的方式去了解“华人化”或“华人的认同”，而是要通过“棱镜”的折射，以选定的华人人口，根据其华人幼儿社会化的特定与具体的个案经验来进行数据的比较，每个个案都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其他前未看清的“影像”。这些个案所涵盖的范围的确有趣。中国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但这些人口却居住在政治与经济体系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区；新加坡的个案代表了一个以华人人口为主，却身处于多元种族的东南亚国家之间，而她又曾一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例子；曼谷的泰华社会阐明了其认同感的问题与其他个案所显示的并不类似；美国的华人居住在具有独特多元文化环境的檀香山和以美国人为主流及美国城市为背景的洛杉矶，也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个案。

然而，又有两个问题产生了：第一，我们如何研究在每一个研究场所华人幼儿社会化类型随着时间而改变？第二，在个别的个案之间，我们又如何确定其类型的同与异？换言之，我们依赖比较作为了解的策略，尤其是下列两种的比较：一方面，比较过去与现在，另一方面，比较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和 David Y. F. Ho 所提出的见解相似，他在查阅了许多属于这一领域的文献之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例如 Ho 1981, 1986, 1989）：

对传统社会化类型有个清楚的轮廓不仅其自身值得注意，而且在策略上也是重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参考架构以测定改变的程度，动力

和方向以及跨地缘政治的变动。

根据此见解加以扩充,我们认为在我们这项研究的每个个案中,我们可以提出六大中心问题,这六大问题互相重叠而又关连到华人幼儿社会化类型的可能改变:

- 1) 哪一些类型已经改变?(变化的内容)
- 2) 它们如何改变?(变化的方向)
- 3) 它们的改变有多快?(变化的程度)
- 4) 它们的改变有多迅速?(变化的动力)
- 5) 改变由何时开始或变得明朗?(变化的来龙去脉)
- 6) 它们为何改变?(变化的解释)

改变的反面是持续。说历史的改变包含了全面的改变,如果不是办不到,也是高度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就算我们所谓的革命也不意味着每样东西都改变,虽然感觉上应该是那样。但有一种改变,虽然并不完整,却仍然是一种根本的改变。换言之,这种改变构成一种基本的历史断层,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性:它是根本上切断了过去与现在的一种经历。然而,尽管有这种根本上的中断,找出哪一些还未发生根本变化或看来维持不变是有趣的。因此,我们了解到改变包含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持续与中断。

事实上,这是我们如何可以了解“传统”与“认同”的课题,我们不能佯装着生活的传统与认同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又没有任何适应与改革的过程。同时,改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或认同都消失,反之,他们可能在新的条件下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可以问的问题不只是在任何历史背景下,哪一些东西持续和中断,也同时包括了他们如何及为何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第一个问题——对于每一个特定的个案,我们可以和应该问些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如何比较两个或多个个案?我们的作法是把所有的答案拿来和同一问题作比较,然后强调其相似与不同之处。因此,这种比较让整体的现象更加清楚与明白地显现出来;因为不同个案之间的变化显示了持续与中断自我显现的条件。

但是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有一先决条件:用 David Ho 的话来说,我们必须要对“传统社会化类型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作为“一个稳定的参考架构”用来测定改变的内容、方向、程度、动力和来龙去脉——在我们对每一个个案和不同个案之间的持续和中断获得充分的解释之前。

我们该如何发展此一“稳定的参考架构”呢?经验上,我们称为“华人幼儿社会化”的社会现象可以指在很大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自我显现的许多现象,这当然是社会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的例子,即如何面对“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社会学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而这可以在麦士·韦伯(Max Weber)的“理念类型”的概念中找到。

在研究社会现实时,“理念类型”是一启发工具。“理念”在这里是和“真实”相对的;它不带有任何合乎道德需求的概念在内,社会现象的好几方面都被选用和吸取。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已被夸大了,以便强调这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因此,“理念类型”就包含了研究人员的概念化问题,它不能作为“真实”的、丰富与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代表。同时,在现实中,“理念类型”有其基础。“理念类型”的元素是取自现实中,而不是来自研究人员所独创或想像。

“理念类型”有时又称为“纯”类型,那就是没有被特定的偏差或例外所污染,这种偏差与例外是真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无可避免的。在现实中,如果“理念类型”的特征是被人为的吸

取,偏差或例外就显现出来,新的问题也就跟着产生:在每一个特定的个案中,“理念类型”以何种方式显现或隐藏起来?如果显现,它说明了什么?它们是如何显现的?如果未显现,为什么?能找到什么“新的”或“不寻常”的特征?它们和那些已显露的“理念类型”的特点如何相互联系,每一个个案和其他的个案又如何进行比较?因此,在推动比较经验式的观察与理论性的了解两方面,都能达到目的。

所以,我们的比较研究,可以通过建筑与利用传统华人幼儿社会化“理念类型”来加以帮助。在这份报告里,我们初步尝试对这一特别的类型,在与其他理论上可能类型(例如“美国”或“泰国”或“日本”幼儿社会化)的对照下,辨明一些主要的“理念类型”的特征。这纯粹是一初步的尝试,因为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与深一层的检阅文献,我们的概念可以加强或扩充。

起初,我们对由什么构成“华人幼儿社会化”有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于像我们一样在“华人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找到例子。许多学者,不论华人或非华人,也都对华人生活中社会化的不同层面加以研究,虽然各种研究跨越了广泛的理论兴趣与经验。

要构造“传统华人幼儿社会化”的“理念模型”,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化,在我们的概念里应有一些系统。首先,幼儿社会化有许多原素,一方面,家长对抚育孩子有自己的“理念”、“假设”、“态度”或“价值观”(为了此讨论的目的,我们应简单地把“理念”当成一般的词语以涵盖每一层面)。另一方面,这些又和抚育孩子的“实践”、“策略”、“方式”或“技巧”(再者,我们也应无分别地把“实践”当成一般的词语)。

这里,我们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家长在言语上明确说明的“理念”不一定反映在他们实际的行动中,它可能显示出偏离与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即父母是否言行一致,这也意味着研究必须包括家长的行为而不只是口头上所说的。这也是为何我们不能单靠调查数据——除非我们可以确定接受调查者没有提供“社会需求”的或“政治上正确”的答案,特别是仍处于重视“面子”的文化氛围里。

同时,我们也能把理念看成是实践的內质的一部分,抚育孩子的理念构成父母所应做或尝试去做的运作概念,无论这理论是否在实践中明确反映出来,在幼儿社会化的实际过程中,它必能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定位。实际上,不是所有抚育孩子的理念可以清晰准确地说明,因为它们深深被埋置在实践中。就如 David Ho 所评论的,“在传统的中国,抚育孩子从未正式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抚育孩子的实践被当成是理所当然,而结果保留成为一相对的未被探索和未受评估的华人社会习俗。”(1981)但要点是:如果有偏离或矛盾,他们自我显示是因为人们首先存有对抚育孩子的理念规范在实践上有问题,实践存在偏离或矛盾只是“负面”地展示了某些运作理念的存在。如果,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显示出“传统”的理念在事实上从未真正的运作,我们就会面对幼儿社会化朝向其他可能的“理念类型”的成份而改变的一个清楚的个案。然而,在更多的时候,社会化过程是处于变化和转化的状况,制造矛盾、困境,甚至冲突,在这些个案中,了解家长对“传统”或其他“理念类型”,在了解与实践之间如何“辨明”或“使其合理化”,对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在我们的传统华人幼儿社会化“理念类型”的概念里,就不应严格区分“理念”和“实践”,我们注意到在 David Ho 的文献评论中始终称为“华人社会化类型”(Ho, 1981, 1986, 1989)。这与我们上述的论点一致,“类型”包含了把理念、假设、态度和价值的一面与实践、策略、方法和技巧的另一面联系起来。

我们根据自己的讨论,David Ho 的文献评论(特别参阅 Ho,1981)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企图建立一个传统华人幼儿社会化的“理念类型”,我们须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一个吸取或辨明这一类幼儿社会化的特征倾向,我们认为社会化的类型植根于复杂的理念和实践中,所产生的倾向可能显现或不能显现——从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途径——在特定的个案中,使我们意识到在时光的转移与跨越不同社会变化环境中的许多问题。

就算在我们考虑特定的倾向,仍存在着如何看待人类的特性的基本问题。传统上,重点是放在人类的“可塑性”的概念上和“塑造人类的潜能的表达环境的重要性”(Chen and Uttal,1988:35)。模范的例证可用传统故事中的“孟母三迁”,母亲为子让孟子远离坏的同伴和不良的影响三次迁居。因此,对于儿童的观念就是“天真无邪”(朴实而无不洁的思想)(Ho,1980,1983,1989)。

华人强调“教养”(教育以培育品行良好的孩子),特别是教(教育)的成份重于“养”(抚育)的成份:“传统上带大孩子的基本关心的焦点是个性的适当发展”(Ho,1981:82)。David Ho 把部分有关的文件以下列方式加以摘要:“传统上,所强调的是服从、行为得体、道德的训练和接受社会义务……”(Ho,1986:35~36)。

David Ho 对抚育孩子所讲的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导向的抚养”。对于把早期幼儿经验和个性发展连系起来,并未获得认可(Ho,1981:82)。我们也考虑 Wilson(1981:123)的观点,即华人的母亲倾向于用爱心导向的方法但其作法又是无意识的。Wu 和 Tseg(1985:8)推测华人心理上的问题(例如代沟、缺乏沟通)可能是由于缺乏感性的表达问题或以心理的名称来表达的倾向。

David Ho 的论点是传统上“教育的目的是初步地把孩子改造成一社会化的成人,使他从中学会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而不是个性的全面发展”。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一名成长中的孩子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单位中及宗族中的一名成员:“首先,尽孝使个人获得尊敬,使家庭获得荣耀。总之,孝道是孩子社会化的最基本指导原则。”(Ho,1981:81)对家长而言,孝道先于其他形式的道德行为(Hall Xu;1990:572)。传统上这是通过“廿四孝”的故事教导来灌输孝道(Tseng & Jing Hsu,1972),这时故事是用来教育而不是作为消遣(cf. Domiao & Hannah;1987)。

孝道包含了子女的听从与哺育等方面(Jorden,1986:52),含有传宗接代的意义,包含了代与代之间相互依赖:孩子以父母亲照顾他们的类似行为来照顾父母(Tseng & Jing Hsu,1972)。重男轻女是导源于孝道的需求,家族是靠儿子来延续,他们得负起奉养年老父母的职责(Ho,1981:94)。

David Ho 在他的文献评论中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华人父母对婴儿与年幼孩子的态度倾向于宽容甚至溺爱,这和他们对于年长孩子的严格纪律形成强烈的对比。……父母对子女态度的改变是在孩子达到能‘思考’或‘懂事’的年龄,大约在4~6岁(Ho,1986)。年幼的孩子被当成是‘无性’(没有性格)而需要贴身的照顾。一旦达到‘懂事’的年龄,孩子就被当成是‘小大人’而期望他们的举动也像大人(Ho,1981:84~88)。”

对于年长孩子的额外要求,是循次渐进的,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有着“高度的持续性”,鼓励“长期的依赖”,由家长为孩子作出重大的决定——顺从家长的愿望——即使在家长逝世以后,孩子是被假定为没有观点或至少被看成就像父或母,自己一点观点也没有(Ho,1981:85)。